

热历史

古人对家燕物候的知与用

□徐颖

家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燕子，自远古时期就出现在先民的视野中，最初人们称它为“玄鸟”，认为它是一种神鸟，对它的记录与描述都有着浓厚的崇拜色彩。随着世人对燕子的认识不断加深，这种神鸟逐渐与社会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其对农业生活的指导上。

预报农时

“春分之日，玄鸟至。”古人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都对应着相应的农时，除了以历法为参考，人们还会将不同时节出现的物候现象当作判断农时的依据。“玄鸟至”便是古人判断“春分日”来临的依据之一。而春分之日对于农业生产又至关重要，俗话说：“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春季来临即意味着大忙季节要开始了，春管、春耕、春耕即将进入繁忙阶段。春分过后，越冬作物进入生长阶段，要加强田间管理。这个时节气温回升快，作物需水量相对较大，农民要加强蓄水保墒。“灞陵桥上燕来时，江田未熟晴芜晓。”这一诗句也说明了燕来时节，是江田尚未成熟的时候。南宋画家牧溪也通过画作传达了燕子在春季到来后的飞行活动作了一系列的画作，如《莲燕图》《柳燕图》等。“白露之日，鸿雁来。又五日，玄鸟归。又五日，群鸟养羞”，燕去之时便是白露时节，暑气渐消，秋高气爽，候鸟开始南飞避寒。“白露”代表着由热转凉，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萧落、成熟。白露时节，正是秋收大忙时，也是农时中十分关键的时段。燕子“秋去春来”的这一特点为古代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指导，故自古以来，便不缺少对燕子的关注与记载。

应时祭祀

家燕物候不但运用于农业生产活动，还被用于统治者有效统治农民的劳动上。例如，《淮南子·主术训》中写道：“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蟆



▲郭味萁画作《花鸟燕子柳枝》

鸣燕降而达路除道……昴中则收敛蓄积，伐薪木”，可见统治阶级运用物候“应时修备”来富国利民和统治农民的劳动。又见：“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意为玄鸟到来之日，要用牛、羊、猪祭祀。说明这一日也与古代祭祀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宋诗人多喜以燕喻人，不过诗句中也常见家燕春秋迁徙时节的记录。“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新社，即春社日，一年农耕的开始，也是古代祭祀土神的重要节日，一般在春分前后，用以祈求丰收。最早只有春社，自汉代以后始有秋社。又自唐宋起，始确定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日。而燕子作为候鸟，恰好其迁徙的物候习性与人类的社日相符；尤其春社，不仅在气候上象征着春天的正式归来，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以及祈祷丰收、关系农耕生活的现实意义。因此燕子被看作象征春社的吉祥鸟，故也称“社燕”。这更能说明燕子与社日之间“关系匪浅”。晏殊的这首《破阵子·春

景》就很明确地表示出燕来之时与春社日相近，社日，是农业文化习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礼乐制度之一的社日祭祀，是统治阶级对农家进行农业意识控制的重要手段。

预知晴雨与防灾

传统农业中，作物生长需要的水分主要来自雨水，所以知晓降水情况，尤其是预知作物生长期、收获期内的降水，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相雨，是农业生产者尝试多种方法来预测短期内的降水情况。相雨的方法很多，物候就是其中一种，因动物的行为活动较容易被及时发现，古人便经常依据动物物候现象来预测晴雨，而观测家燕物候就是古代农业生产者常用的一种相雨方式。

“燕子低飞大雨到”，是一条人们耳熟能详的谚语，并一直被广泛运用。燕子在降雨前会降低飞行高度，一方面是因为气流变化，另一方面是昆虫在水汽的影响下降低了飞行高度，燕子为了捕食也只好相应地降低飞行高度。燕子喜筑巢于檐下，日常活动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田家五行》中有谚“海燕忽成群而来，主风雨。谚云：乌肚雨，白肚风。古人常见燕子自远方海面飞来，便以为燕子来自大海，海燕成群的飞来便预示着风雨将至。燕子喜于檐下做巢，故而亦有谚：“燕巢做不乾淨，主田内草多。”来警示人们要关注田内庄稼的生长情况，便于及时除草，杂草多则不利于庄稼的生长。同时也有“小燕前寒食呵米，过寒食呵水”“乌鸦燕子飞得低，明天一定雨凄凄”“燕子高飞晴天告，展翅低飞大雨报”等这样的农谚来告知人们燕子低飞时，往往预示着雨天即将到来，农民要及时地做好农田防护，预防被大雨或暴雨造成损失与伤亡。

家燕物候现象是古人认识自然、把握自然规律的重要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体现了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们从物候现象为媒介，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它对人们日常生活、民俗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气象报》）

古风

魏晋春游：交流学术，组织派对

□孙璞

西月初年，在官方的节日上已节里有“曲水流觞”的习俗，人们期望以此洁身袪除、禳灾祈福。此后，“曲水流觞”就成为春游的一项重要活动。和孔子与弟子们简单的郊外“浴乎沂”相比，魏晋时期的社会精英们显然有了更高追求：地点要风雅僻静，人物要有学术地位。在潺潺清流里放置酒杯，高谈阔论的精英们随时可取而饮之，展示名士风流就是“曲水流觞”高端论坛的目的之一。

史上最著名的“曲水流觞”是书法界一哥王羲之发起的。他向谢安、孙绰等多位有头有脸的亲朋好友发出邀请，称在春天举行修禊祭祀仪式后，在他的兰亭里来一场曲水流觞的雅集，欢迎大家拨冗出席。这是一场诗与酒的盛会，王羲之也乘着酒兴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描绘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虽然文章内容远没有形式（书法）让人惊艳，但也足以让这次聚会流芳千古。

王羲之的派对高端大气有档次，正值魏晋时代“玄学”大热，文人把理想与抱负寄托在山水中。比他更彻底的是“竹林七贤”，这个魏晋男子第一天团常常饮酒聚会，放情纵歌。其中动不动就翻白眼的阮籍最喜欢郊游，“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但阮籍只是穷游派，走到没路时只能“大哭而返”，而有钱的谢灵运就不同了，他可是装备精良的资深驴友。据《南史·谢灵运传》记载，他有一套春游登山的行头：“头戴曲柄笠，脚踏木屐”，这种“木屐”被称为“谢公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前后都有齿钉，登山很科学。有文化有钱，热爱旅游，还跨界做设计，谢灵运这真叫一个炉火纯青。

（《广州日报》）

生活史

古人爱在寺观园林中题诗

□魏景波

题壁风尚起源于秦刻石之风与题字之习，至东汉出现以诗题壁的记载，经六朝发展，唐代之时已蔚然成风。唐代雕版印刷初兴，还尚未用于文学传播，加以纸张昂贵，于是诗歌题壁成为风尚，京师长安尤甚。

寺观不仅是礼佛修行之所，也是世俗交往的公共空间。长安城内各坊有寺院一百六十多处，道观亦有数十所。有些寺观规制宏大，如靖善坊的大兴善寺、保善坊的昊天观，甚至占有一坊之地。寺观之内，殿庭宏丽，花木茂盛，壁画多彩，法会盛行，类同于公共园林，往往也是文人墨客雅集题诗的佳处。

安国寺位于毗邻大明宫的长乐坊东部，本为睿宗藩邸，景云年间敕立为寺，是带有“官寺”性质的京师名刹，文人题咏甚多。钱起《同王尚书起居程侍郎中书舍人题安国寺用上人院》前半云：“慧眼沙门真远公，经行宴坐有儒风。香缘不绝禅裾会，禅想宁妨藻思通。”佛门而有儒风，禅林而通藻思，正是文人雅意所在。从诗题看，钱起与王籍、程浩、韩翃等人在此相聚赋诗并题于壁上。

大慈恩寺占有晋昌坊南半坊之地，亦为佛门大刹，文人辞客题诗、诗板甚多。如白居易《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许棠《题慈恩寺元遂上人院》、郑谷《题慈恩寺默公院》、荆叔《题慈恩塔》等，几首诗可以按时序编一部“慈恩寺题诗史”。计有功《唐书纪事》载：“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开，太平院开最后。（裴）潏作白牡丹诗题壁间。大和中，驾幸此寺，吟玩久之，因令官婢讽念。及暮归，则此诗满六官矣。”裴潏于寺壁题诗，相当于传播的开始。文宗的咏玩激赏，属于“意见领袖”加持的“二次传播”。其他著名寺院，如新昌坊青龙寺、延康坊西明寺、安仁坊荐福寺、靖善坊大兴善寺等也是文人雅士题诗之所。

宫观题诗如白居易退居华阳观准备制举，作有《春题华阳观》。武元衡有《夏日陪冯许二侍郎与秘书游昊天观览旧题寄同里杨华州中丞》，昊天观是长安最大官观，武元衡“览旧题”，可见此处题诗甚多。齐己有《赴郑谷郎中招游龙兴观题诗板谒七真仪像因有十八韵》，可见龙兴观亦备有诗板。

驿站客舍等处题诗也多常见。如韦蟾《长乐驿谯李汤给事题名》、无名氏《题长乐驿壁》，以及钱起《下第题长安客舍》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史拾零

哪种动物成为“家”的代言人

□王磊

猪的本字为豕，甲骨文突出一个大腹便便，膘肥体壮。中国人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中国人的养猪技术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那就是发明了阉猪术。阉过之后猪的活动量降低，出肉率提高。殷商时期“家祭即以豕为之，陈豕于室，合家而祀”，可见猪是当时家庭祭祀中的重要祭品，养猪已经非常普遍了。

猪在六畜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因为“家”这个字就是一个房子里养着一头猪。猪为何能击败牛、马、羊、鸡、狗，成为“家”这个含义的代言人呢？这恐怕和猪的习性有关。

《说文解字》中说，“家者，居也”。家既指物理上定居的地方，也指血脉上的归属。

猪是“六畜”中最能代表定居生活的动物。商周时期家猪虽仍是放养，但已经有了专门的猪舍。汉

代以后养猪一律用圈养的形式。

圈养的猪不但长膘快，收集的粪便还能用来施肥，也符合古人定居在一个地方搞农业的习惯。

另外，由于猪是杂食性动物，在吃这方面堪称来者不拒，可以完美契合人类的定居生活。

养出的猪既为活着的人提供肉食，也为故去的祖先奉上贡品。只有家里养了猪，才意味着不再四处漂泊，拥有了真正的故乡。

（《北京青年报》）